台灣國家安全與台海關係的發展—經濟安全

●黃天麟／前總統府國策顧問

一、國家安全——一個絕不變移的方向與目標

台灣是一個國家，但卻在中國之制壓下得不到世界主要國家之承認，軍事上有中國即時的威脅，經濟上受中國強大的磁吸。中國有一不移之目的——消滅台灣島上的政府與國家，但我們也有一永不改變的目標，即：防範中國之侵略、滲透、分化及磁吸，捍衛台灣這一國家，建設我們美麗自由的家園。

二、經濟安全

從前「帝國」談論國家安全都著重於軍事，社會、經濟安全，即常居於次要層級。然長期強大軍力之維持，卻有賴於相對之經濟力量，即所謂的國富與國力。進入二十世紀中葉之後，隨著科技工業技術之突飛猛進，經濟（即國富與國力）幾乎可以說決定了軍事，蘇聯鐵幕一夜間裂解崩塌，就是經濟無法支撐軍事的明顯例證。所以，當今談論「國安」（國家安全），「經安」（經濟安全），應已凌駕一切，成爲建構「軍安」、「社安」的先行條件。

三、經安在台灣之特殊性及脆弱性

台灣之「經安」，因中國之採取「以經促統」政策，而具特殊性，也加重了其重要性。當台灣之「軍安」由美國經由第七艦隊之派遣、協防條約及往後替代之台灣關係法，獲得後援之後，北京即自估以武力攻台代價過高，決定利用「商人逐利之本性」及「以大吃小」（即利用中國之土地爲台灣之267倍、人口的57倍之懸殊利基）之經濟市場原則，採取「以經促統」策略。北京的此一決定，不但將台灣之經安推上國家安全的第一防線，也因正中國人人性最爲脆弱之一環，成功地讓台灣自暴出其「經安」的最大弱點。此一弱點又因國人長期受統派媒體之洗腦、接受蔣氏政權長達四十多年之「中原、大中華」思想教育，而加重其脆弱性及嚴重性。北京的「以經促統」策略，經二十多年中國官方之精心策劃，獲得莫大成效，也是經五十年辛苦奮鬥方得實現的台灣本土政

權，竟然會在八年之後，由國人之手，以七百多萬票予以摧毀，選出明顯標榜「終極統一」的總統的主要社會因素。

四、戒急用忍vs.大膽西進

我國「經安」之惡化，萌芽於九〇年代民進黨「大膽西進」的對中經貿政策論述。當執政的國民黨領導人對中國之「以經促統」攻勢，採取保守防衛政策（即戒急用忍）之時，自許爲代表本土勢力的民主進步黨卻採取「大膽西進」政策（1996年選出許信良爲主席），對當時國內促統勢力及北京的「以統促統」政策，不但未加防備，反而予以配合，大大也弱化了李登輝戒急用忍政策的有效性。「西進投資是資匪」的社會認識，及對西進的「罪惡感」，也就在「大膽西進」及統媒的渲染下逐漸趨於淡薄。2000年民進黨執政立即拋棄「戒急用忍」政策，「大膽西進」即以「積極開放」之新名詞替代成爲政策。次年，扁政府旋即利用「經發會」，甩開要求加強經安措施一派之糾纏，一舉開放七千多項製造業登陸投資，揭開了中國「傳統產業升級轉型」的大躍進。彼長我消，2005年，中國一躍成爲世界資訊產業大國，我國的經安及國際情勢也因此急轉直下，加諸台灣的所謂的「麻煩製造者」（Trouble maker）頭銜，其實也是中國經貿勢力崛起，加強了中國在西方政治遊說力道的必然結果。

五、經濟安全指標之消長

台商對中國之投資，估計約達四千億美金（依遞交美國國會的一份報告推估），台商在中國保守估計僱用千餘萬人，出口約占中國總出口之40％，但所帶來的是彼長我消的所謂的「台灣邊陲化」效應。1990年台灣之對外貿易量還在中國之上（台灣爲一千二百一十九億美元，中國爲一千一百五十四億美元），1999年兩國相差仍然不大，中國只是台灣的1.55倍。但2000年後情勢大變，中國對外貿易一躍達到二兆一千七百三十八億美元，成爲世界第二大貿易國，科技資訊產品即其出口大宗，遠遠把台灣拋下。GDP之變遷亦復如此，2007年中國在綜合國力的GDP已是台灣的8.83倍。中國之外匯存底更是驚人，2008年底達一兆九千億美元，高居世界第一，其中台商之貢獻「罄竹難書」。但一方面台灣經濟之國際競爭力即相對走貶，製造業之附加價值率由1999年之27.7％萎縮至2005年之僅20.1％，電子零組件之附加價值率在1990年至1999年之戒急用忍期間還在上升（由31.6％升至32.0％），但自2000年後快速下降，至2005年只有17.1％。台灣廠商海外（主要在中國）生產比例，也年年爬升，至2007年幾達國內產值之一半，此情形在其他國家絕無僅有。台灣產品在美國之市場亦逐年由中國產品所替代，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佔據率在2001年後直線上升，由7.98％（1999年）提升至2005年之14.57％，象徵了中國在美國的遊說力量。台灣即由3.43％降至2.08％降幅達40％。最令人憂心者，即是對中國投資之增加，排擠了國內投資，近幾年，國內投資率均遠比鄰近的韓國爲低。雖然對中國之投資帶動了設備及中間產品之出口，但我國出口之對中依存度即年年攀升，

2007年達39.6%，此種趨勢極可能會因台灣經濟之凋零弱化，或因台商對中國之上游投資日趨完備而反轉直下，使台灣經濟一蹶不振成千古恨之局。

六、明知山有虎「扁」向虎山行

「以經促統」其實並不是陰謀，而是陽謀，北京政府也在各種場合公開談論此一政策，只是扁政府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」，此行也註定了今天台灣的噩運。中國深知，以中國土地之大，人口之多，加上文化、語文、教育背景，必能如黑洞般地將小經濟體的台灣吸盡，完成終極的統一。不幸的是，愚蠢的本土台灣政治人物竟也在商人的利誘之下，完全放棄了領導者應領導輿論的政治責任，還配合了中國之「以商逼政」政策，歌頌中國台商之貢獻，時而大談經濟統合之「勢在必行」，營造出「台灣經濟靠中國」、「兩岸關係位階高於國際外交關係」之一般社會認識；一方又因產業過多過快之西進，造成國內投資、國內消費之下降[1]，國民實質薪資成長率為之呈現負成長，實質失業率大增，年輕人為此失去了信心，有的甚至心向中國，國人對中國之敵我意識，隨之日趨模糊，奠定了親中政權奪權的廣泛社會基礎。

七、親中政權的「以經促統」政策

政治可以影響經濟之走向，但經濟最後決定政治。中國巧妙運用了這一原理，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完成了它艱難的使命──孕育親中政權。

換言之，對中經濟之傾斜必然會促使親中政權之誕生，而親中政權成立的使命就是完成「以經促統」的後半段──終極統一。這就是中國「以經促統」的政策極致。2008年5月，親中政權走馬上任，九個月來的表現，可以說完全符合了中國的政策目標。從「終統」之角度言，其「促統」的政績是斑斑可考的，包括：解除對中投資40%上限，開放晶圓、面板等產業登陸，全面直航、截彎取直，人民幣在台兌換等，雖然面對全球金融海嘯之國內施政乏善可陳，致使台灣淪為金融海嘯受害最深的國家，唱衰台灣也因此一躍成為國際媒體的時尚，但對兩岸經濟統合之推動方面即勁力十足。馬總統接受Taipei Times專訪時還明確表示，「兩岸必須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，這是競選政見」，2月21日召開的「當前總體經濟情勢及因應對策」會議中亦堅定要求政院推動簽訂「兩岸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」，並將其名稱定調為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（ECFA）。全面與中國統合結成緊密的「一中市場」架構，儼然已是馬政府最主要的施政目標，「經安」即完全不在馬政權所考慮的任何選項。事到如今，只有「徒呼奈何」之感。

八、民間國是會議

易言之，當今台灣之「經安」已面臨全面崩潰的危機。民進黨與台聯黨2月21～22日聯合召開了「民間國是會議」，台聯黨主席黃昆輝做總結報告時，發言慷慨激昂，痛批

簽訂ECFA之錯誤政策，強調：「若馬政府仍一意孤行，一定要號召社會各界及全民站出來，甚至不惜發動罷免」。雖然現場也響起熱烈掌聲，問題是，當今最大反對黨的民進黨的態度又將如何？長期受「大膽西進」、「固本自信」、「積極開放」、「自信開放」等對中經貿政策圭臬薰陶的民進黨人，對台灣經安面臨之浩劫，國之因此將亡，是否具有深刻的危機感，能否據此揭竿而起，是當今國人所關切的問題。最近才回窩的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，在出席民間國是會議時還提議表示，「他不認爲馬總統的兩岸政策是錯的，只是馬總統開放得不夠徹底，台灣必須和中國更緊密整合」。此種「經統」（經濟統一）主張在民進黨內並不是少數，而且是主導的力量，民進黨之願讓許信良回窩，就是明證。民進黨能否在往後的民間國是會議中徹底揚棄一中市場的思維，力主國家經濟之安全（國安），也將是此次民、台合辦的民間國是會議成敗之關鍵，國人只有拭目以待。

九、經安機制

1. 成立「經濟安全委員會」（可在總統府國安會、行政院、立法院下）對敵對國家設定經濟安全指標，定期檢討。
2. 對敵對國家之生產性投資做積極之管理與管制（或誘導至東南亞友好國家）。
3. 推動國安立法，將經安機制予以法制化。[2]
4. 研究分析中國「以經促統」之政策思惟，闡述小經濟與大經濟體的經濟統合過程中必然產生的「邊陲化市場原理」，藉以揭穿北京以商圍政之謀略。
5. 將過去錯誤之對中國開放政策（如因此所產生的失業、實質薪資之減少、民間投資之萎縮、民間消費之下降等等弊端）明確告訴社會大眾，扭轉「經濟靠中國」之迷思。（第 4、5 項宜由政黨、智庫、民間社團推動）[3]
6. 全力投入改善台灣投資經商環境、建設台灣爲「高科技製造及研發中心」。
7. 締造經濟發展成果能滋潤全民之社安社會。

【註釋】

1. 民間投資年增率在1995～2000年期間爲10.6%，2001～2007年間降至3.5%；民間消費年增率1995～2000年間爲5.9%，2001～2007年間即僅及2.4%。
2. 2005年民進黨主導的修憲斷送了此種立法之可能性，也斷送台灣的民主與將來。
3. 民進黨宜自我檢討過去八年之執政錯誤，修改或廢棄2001年通過之「開創台灣經濟新局決議文」（該決議文將積極開放、大膽西進予以黨綱化）回歸正確而邏輯一貫的本土政黨應有路線。◆